

二十一世紀評論

《共產黨宣言》一百五十年

《共產黨宣言》的現實性

• 杜 蘭
(Alain Touraine)

從70年代經濟全球化以來，我們正處在第二個資本主義革命時期，人們用全球化的稱謂掩蓋了其本質，就像馬克思認定的，商品的統治事實上就是資本主義的統治。經濟再一次成為絕對的強權，社會和政治的舞台好像是虛空的。沒有一個文獻比《共產黨宣言》的第一部分更好地說明了現在的這種狀況。

重讀發表於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你會驚訝它的現實性。從最初幾頁起，我們只需將「資產階級」(bourgeoisie)換成「全球化」(globalisation)，就會立即發現與今日如出一轍的商人、金融家們的歡心鼓舞，以及那看起來似乎無所不能、摧毀一切人類有特色的生活經歷、文化、技藝的經濟威力。對馬克思來講，這些令人驚異的、常被認為是謳歌資產階級的文字，其實只是作為一種召喚無產階級所必須的文字準備。是的，歷史的輪迴已經告終。1848年時，資本主義革命開始擴張，也就是說，經濟開始拋棄所有內在的社會、政治控制形式，並拒絕除了利潤追求之外的任何其他評價原則。在此階段之後，出現了默哈埃(Charles Moraze)稱之為征服的資產階級時期——一個最粗暴的無產階級化和剝削的階段。這段期間，逐漸形成兩種趨勢：第一種趨勢乃由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創設，後經英國式的工業民主思想和社會民主政體再修正而最終形成的福利國家。它雖然控制或至少部分控制了不平等的狀況，但也漸漸蛻化成一種只對國家控制和有組織性的既得利益有利，而不再照顧那些最貧弱、受壓制階層的制度；第二種是革命的趨勢，它特別在那些掙脫傳統的社會和權威、急劇地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國家裏得到發展。在蘇聯革命之後的四分之三個世紀，受這個革命啟發、鼓舞而建立起來的絕大部分政體已經消失，它們遺留下來的，不過是巨大的血迹和經濟崩解的黑洞。

從70年代經濟全球化以來，我們正處在第二個資本主義革命時期，人們用全球化的稱謂掩蓋了其本質，就像馬克思認定的，商品的統治事實上就是資本主義的統治。經濟再一次成為絕對的強權。人們到處談論民族國家的衰弱，談論那些過於邊緣化或與權力聯繫過於緊密的社會運動的解體，談論那些有特色



我們可以毫不困難地找到那些同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批判和譴責的類似的現代意識形態。然而，批判的工作一旦完成，擺在我們面前的中心問題便是：甚麼樣的積極力量能夠產生集體的行動，從而激發重建那被經濟利益的絕對追求所壓毀的社會和文化生活？

文化的毀滅或是那種頑固地為護衛文化認同而出現的自我封閉現象。社會和政治的舞台好像是虛空的。人們只談論世界經濟的強大威力與無所不在，這使所有對它進行控制的企圖和努力都變成癡人說夢。沒有一個文獻比《共產黨宣言》的第一部分更好地說明了現在的這種狀況。

但是，對全球化的讚歌和對它的絕對化的譴責已經屬於過去。就此，同樣應該追隨馬克思的榜樣，因為我們到處都感到那種重建社會和政治生活而不是任全球化的經濟力將其控制的緊迫性。十九世紀初，許多知識份子和一些工人抗拒工業化，可他們的懷舊並沒有產生持久的影響，原因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已經成為事實。但漸漸地（特別是受馬克思的影響），這種反工業主義演變成反資本主義。工人運動不再批評工業發展，而轉而攻擊實行工業化的方式和日漸增長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今天，我們看到那些宣稱一定要在經濟進步和社會進步之間作出選擇的觀點的消失。例如在西歐，幾乎所有國家都實行中間偏左的政策，要麼是像布來爾 (Blair) 的中間主義，要麼是像法國約瑟班 (Jospin) 的偏左，要麼是像普諾第 (Prodi) 或將來斯寇德 (Schroeder) 的中道政治。在可見的將來，希望將只屬於那些相信必須結合經濟的開放和社會的整合、重建的人們。

這裏存在一個所有人都要直接提及的問題：馬克思既論述無產階級，亦談及資產階級，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資產階級，但那些無產者到底在哪裏？有人會立刻回答說：他們到處可見——失業者、無穩定收入的從業者、因缺乏工作而被迫移居他國的移民、逃離新生專制政權的政治和經濟難民。然而，這些人同馬克思所觀察到正在誕生和上升的無產階級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馬克思所談論的是剝削和統治的社會關係；我們看到的卻是邊緣化、社會排斥、背井離鄉的現象。馬克思的理論並不拒絕現代經濟的凱旋，相反，依照一種黑格爾

式的思想，他認為無產階級若重新找回它的理性和消除資本主義的利潤，將會實現歷史的進步。與此相反，今天那些試圖改變悲慘狀況的行動要麼是局限於基本的經濟主義，要麼是尋找、創造一種反文化。恰恰是在這裏需要重歸馬克思和恩格斯，因為他們用極大篇幅來批評那正在追隨錯誤路線的新生共產主義。我們可以毫不困難地找到那些同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批判和譴責的類似的現代意識形態。然而，批判的工作一旦完成，擺在我們面前的中心問題便是：甚麼樣的積極力量能夠產生集體的行動，從而激發重建那被經濟利益的絕對追求所壓毀的社會和文化生活？

在變化不斷加速、各種交換增多從而使社會以至文化多元化的模式下，捍衛文化認同與民主政治行動能力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對某些國家來講，危險在於它們不認為這兩個目標是可以結合協調的，這樣只會助長野蠻與專制政體或是潰亂的勢力。

自然，馬克思的思想屬於它的時代，但我們可以對其再思考以便為今天的問題找答案。對馬克思來講，只能藉由統會以下兩種進程來打破資產階級的絕對統治：首先是資本主義矛盾的自然加深，日漸增長的社會兩極分化，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其次是召喚一種能推動具體存在的使用價值，各種需求的發展解放而並不只具社會性質的力量。這裏不僅只涉及重建正義、美好的生活，而且亦需要實現一種解放。由於資產階級的統馭和商品的宰制已變成整體性，因此，若要擺脫它就必須召喚一種歷史的必然性（這表現在資本主義增長着的內在矛盾的思想）；同時，亦要召喚一種既非社會也非自然的力量，這種力量的性質類似於進步觀念和黑格爾的精神實現，或像啟蒙思想家們所宣稱的理性的凱旋。由此，社會會從上下兩面同時被重建，一如經濟生活同時與合理化和作為絕對原則的解放重新協和。

馬克思的思想與法國大革命的思想相距甚遠，但性質卻相類。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將公民置於將要建設的社會的中心，而馬克思則將勞動者置於同樣的位置，但這勞動者不只是經濟行動者，他亦是由需要與能力所構成的人的象徵。今天，經濟生活日漸被信息工業和通訊支配，其生產的文化財富甚於物質財富，而支配着人的統治世界乃至人自身的存在亦變得異常複雜，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人權等都直接形成問題。在政治解放、經濟解放之後，我們今天需要文化的解放，它應直接表現在倫理對利潤的統治的節制上。

廣義上講，在變化不斷加速、各種交換增多從而使社會以至文化多元化的模式下，捍衛文化認同與民主政治行動能力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對某些國家來講，危險在於它們不認為這兩個目標是可以結合協調的，這樣只會助長野蠻與專制政體或是潰亂的勢力。

很容易也應該注意到1848年與1998年之間的距離，但更需要重新找到自《共產黨宣言》發表至今那種在理論與實踐上的連續性。對這兩個相距遙遠的年份，必須同樣發現那些內在於統治制度與自由原則之間的矛盾，這自由的原則就是用那不可剝奪的權利去抗拒經濟的統治和對其進行庇護的各種政治與法律。

張倫 譯

杜 蘭 (Alain Touraine)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教授